

# 老太原清明节的“柳文化”

彭庆东



门上插柳

“忽见家家插杨柳，始知今日是清明。”杨柳在这里指的是柳树，“插杨柳”则是清明时的一种习俗。老太原的清明节里，杨柳鲜活的禀赋令人神思所往，展现出了底蕴深厚的“柳文化”。

老太原清明节里的“柳文化”，不仅底蕴深厚，而且丰富多彩，除插柳之外，还有赏柳、戴柳、挂柳……

老太原清明节与杨柳的这种不解之缘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：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，曾割下股肉给重耳充饥。重耳复国当上晋文公以后，介子推便携老母隐居绵山。晋文公感恩心切，烧山欲逼他出来受封，介公不肯，和老母双双被焚于一棵大柳树下。翌年，晋文公率领众臣重上绵山祭拜介公，竟发现与介子推母子同难的那棵柳树枯枝发芽，死而复生，于是赐封其为“清明柳”。清明由此与柳树结缘了，清明节里的杨柳便被赋予了“故园肠断处”的情感色彩。

插柳，是清明节里的一项美好祝愿。插柳，有门上插柳、坟头插柳等方式。门上插柳除了纪念介子推外，据说可以辟邪驱疫。老太原人认为在门上或门前插柳，可以防止“鬼”的骚扰侵害。这在《齐民要术》里也有记载：“取柳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。”虽说此并无科学道理，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，也可谓是老太原人最简易的一种免疫“告示”：随着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各种蚊虫虫害开始复醒，需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。

还有的人家把柳枝插于门楣或屋檐下，观其枯嫩，用来预测天气的阴晴变化，这源自于老太原的一句“柳谚”：“清明晒得柳干枯，又有干面又有麸。”柳枝成了一件简单的气象预报工具。此外，也兼有“以迎元鸟(燕子)”的乐趣。

插柳还是一项荫及后人的务实行为。太原独特的气候、地理环境使得柳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柳条入土即活，插到哪里就活到哪里，因此，清明插柳类似于今天的“植树节”。太原诗人白居易就偏爱植柳，他的一首长篇诗词《东溪种柳》堪称一部“种柳教学指南”：“野性爱栽植，植柳水中坻。乘春持斧斫，裁截而树之。”诗中的“乘春”即清明前的日子。诗人趁着清明时节的暖暖春意修剪柳树，将砍断下的枝干栽截成段，挖坑种植。在杭州刺史任上，白居易十分注重西湖的环境保护。他作出规定：谁破坏了西湖的环境，就要受到惩罚，如果是穷人就罚他在西湖边上种树，是富人就罚他到西湖上去除杂草。由于白居易的努力，西湖及周围“湖封尽拓，树木成荫”，更加秀丽。

1941年的“八一”节，一二〇师各旅和晋绥几个军分区的剧社，汇集在吕梁兴县的大善村举行联合会演，演出结束后，贺龙师长特别指出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，文艺工作的进展跟不上战争形势的需要。他号召：“你们要到连队去，到战士里去，到敌占区去，到斗争的最前线去……”

同志们经过认真讨论，检讨了近期较多在后方机关演大戏和闭门造车搞创作等倾向，立即采取行动，把剧社分成若干演出组、辅导组，大家分头到连队和农村中开展工作。同时，从剧社抽出十一人(包括两名女同志 and 两名儿童团员)组成了一个精干的“游击剧团”，计划到晋中敌占区边沿开展文艺宣传活动。

贺龙师长批准了“游击剧团”的计划，表示大力支持，并对演出和安全生产工作作了详细指示。

游击剧团由欧阳山尊同志任团长。为了加强自卫能力，剧团成员携带武器，同时，每人还背了一条夹板，用捆背包绳把夹板扯起来就是舞台。演出用的道具、服装、乐器、化妆品等，也都分开携带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。另外，还背了一套简易的油印工具，准备随时随地印制宣传品。

周士弟参谋长还派来了七个人的武装班，负责侦察、警戒、通信联络，配合剧团到晋中平川去演戏宣传。八月中旬的一天，众人从兴县西集村出发。

在征途中，大家严格执行军事纪律：行军中，派出尖兵和后卫；到驻地，设立值夜和警戒。这一路上，不仅加强军事警戒，还得加紧排练，排练的节目有独幕话剧《陈平山回家》《宣传》等，还有欧阳山尊一边采访一边写出的独幕话剧《警备队长》和歌曲《冲锋向前》《手榴弹开花》，以及故事朗诵、口琴重奏曲等。剧团带着这些短小精悍的节目去前方演出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剧团先在文水和交城交界的东北、西北地区活动，此处离日寇的据点开棚镇很近，武装班放好警戒，剧团就在树林里围起舞台进行演出。之后，剧团又到离文水县城不远的地方活动。由于敌人占领着产粮的平川地区、山区，抗日根据地军民用粮部分要靠晋中平原的敌占区来供给，游击剧团便随同军区分区部队晚上到太汾公路以东运粮。一次，部队一下山就把敌人的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起来，乡亲们赶着大车、吃着牲口、肩挑背扛，把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备好的粮食连夜往山里运。剧团的人，除组织群众安全运粮外，有的人手里还提着浆糊桶，口袋里装着宣传品，看准地方就张贴，一直贴到敌人据点的寨门上。

更多的时候，游击剧团是“进村就访，访了就写，写了就演，演完快跑”。到了九月末，剧团转移到清源、徐沟一带活动。有一次，剧团随着工卫旅的二十一团，从交城和清源交界的边沿山区出发，趁黑夜进入汾河沿岸的敌人心脏地带，迎接从太行边区越过同蒲铁路而来的一支兄弟部队。剧团随大部队一口气赶到汾河边上，一面贴标语、散传单，作口头宣传，一面到村里找负责人，动员运输力量，成功掩护兄弟部队过河。

过了十一月，游击剧团接到师首长的电报，到军分区机关驻地完成最后一场演出，然后踏上归程。

## 红色记忆

## 欧阳修力主屯垦戍边

孙 琨

北魏到唐时期，是晋阳建设的高峰期。人口急剧增加，经济高速发展。到北宋攻打晋阳城时，晋阳城户已经达到15万余户。

宋太宗赵光义的一把大火，让有着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、发达经济的晋阳古城变为废墟。之后，出于国防的需要，宋太宗除修建了收容难民的小城外，又命大将潘美在晋阳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太原城。新城建成七十七年后才恢复太原府的建制，但经济已经一蹶不振。

潘美驻扎太原期间，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，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，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。《永乐太原府志》载：“潘美帅河东，避寇钞为已累，令民内徙，空塞下不耕，号禁地。而忻代州、宁化火山军废田甚广。”人口的锐减，耕地的撂荒，使得太原这座北方重镇显得凋敝和穷困，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风采。



耕耘

## “没识足”

刘小三

在晋陕蒙接壤的地区，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土话叫“没识足”。这里“没识足”的“识”字究竟是用“识”贴切，还是用“十”贴切，再或是用“实”贴切，没有确切的说法。

“没识足”的意思比较浅显，就是永远不会感觉到满足，故而一直在追求、获取、贪图、占有。这种过程和现象就被这一带的人叫做“没识足”。“没识足”有些人是与生俱来的本能，有些是后天在不断效仿、攀比、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习惯和意识。现实生活中“没识足”的人和事并不少见，比如你睡觉觉了，家人会说，“没识足”，太阳上来丈二高了还不起；再比如你吃饭吃了一碗又一碗，已经打饱嗝了，还在吃，会被人说，“没识足”，不怕撑破肚皮；过去，有的人家本来就穷，但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，一连要了五六个孩子，人们会说，“没识足”，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；前些年，有些拉煤车司机，为了多拉煤，严重超载，事故频发，这些司机就是“没识足”。

“没识足”一般是指特别过分的人和事，而且还都是些不被人们看好、待见的人和事。用“没识足”这句土话评说，也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斥责。对于充满正能量，不自满，积极进取的人和事，就不用“没识足”来评价了。比如晋商从小到大，不断发展走向辉煌，那就不叫“没识足”，而是用敢为人先、诚实笃信、勤奋敬业、发展壮大等词汇；

树，一度绿柳成荫，为区别于老城中心的柳巷名称，故起名“绿柳巷”，后又衍生出绿柳头条、绿柳二条及绿柳东巷等。当时城北墙根内成为赏柳佳地，诗意融融。

戴柳，承载着“枯木逢春”的希望和梦想。传说晋文公赐封“清明柳”时，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，以示怀念，群臣纷纷效仿，相沿成习，后人即将清明里的柳树寓意为“枯木逢春”，又因为“柳”“留”谐音，所以清明的柳枝发芽就让老太原人认为好运到了，要“柳”住好运。在清明时节门前插柳的同时，就有人家把柳枝编成环状戴在头上，意寓长命百岁，留住好运和福气，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身体虚弱的人，把柳枝戴在头顶意寓枯木逢春，祈盼身体康复。当年的李唐王朝似乎对清明节颇为钟情，起兵太原时，俗称“太原公子”的李世民就赠予属下柳圈，以示赐福驱疫，这应与清明插柳、戴柳的习俗有关。不过，后世的戴柳习俗没有过多的讲究，孩子们把柳圈戴在头上，只是模仿战争片玩游戏而已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此诗历来令清明时节的人们情绪惆怅，但在老太原人的情怀里，融入了“柳文化”的清明节，却是将庄严的祭祀与轻松的娱乐活动结合起来，构成了一幅太原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北宋仁宗年间，欧阳修以知谏院出为河东转运使。是时赋敛过重，民所不堪，欧阳修在描述其所见的山西风貌时曾说：“今河东路山荒甚多，及汾河之侧，草地亦广，见其不耕之地甚多。”到宋神宗元丰年间，山西的耕地面积还不如一个开封府的耕地面积多。《元一统志》载：“以知谏院出为河东制置使。修奏：‘忻、代、岢岚、火山，并边民田，废不得耕，号为禁地。吾虽不耕，而辽常盗耕。若募民计口且尽为兵，量入租粟以耕，几可得数百万斛。不然他日且尽为敌有。’议下太原，帅臣以为不便，持之久，乃从。凡河东赋敛过重，民所不堪，奏罢十数事。改河北转运使。”

欧阳修这位官至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的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在出任地方官时，对于山西的经济形势有直观的感受和明确的认识。农耕文明时代，发展经济，增加耕地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手段。对于大片撂荒的土地，欧阳修感到痛惜。在“奏罢十数事”外，朝廷有了反应。《永乐太原府志》载：“欧阳修尝奏乞耕之，诏范仲淹相视，请如修奏。寻为明镐沮挠，不克行。及韩琦至，遣人行视，曰：‘此皆我眼田，民居旧迹犹存。今不耕，适留以资虏，后且皆为虏人有矣。’订议议非是，遂奏代州宁化军宜如岢岚军例，距北界十里为禁地，余则募弓箭手居之。会琦去，即诏富弼议，弼请如琦奏。凡得户四千，垦地九千六百顷。《元一统志》：地近山水，好尚自殊。”欧阳修建议解除代州、宁化军、岢岚军、火山军沿边之地禁耕令，以增产粮食，供应边防军需。奏章上奏朝廷后，朝廷让范仲淹来视察，范仲淹同意欧阳修的建议，却为军帅明镐所阻。时隔十年后，北宋政治家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到并州任职。支持欧阳修当年的上奏，否定了明镐的阻拦意见，再次向朝廷建议，在代州、宁化以距离契丹边界十里之内全部招募弓箭手居住。这种屯垦戍边的政策得以实行，一举增加军户四千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。

耕地的增加，带来田赋收入增加，对于当时的北宋朝廷，不但稳定了民心，而且为政权的稳固打下了经济基础。欧阳修这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文学家，在山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体育运动健儿刻苦训练，不断挑战自我，勇攀高峰，为祖国争光，也不叫“没识足”，而是用不断冲刺、顽强拼搏等词汇。

“没识足”的反义词是“适可而止”。倘若人们能处处做到适可而止，做什么事情都有个度，那会减少好多麻烦。比如喝酒不要“没识足”，要适量、有度，不要喝得烂醉如泥，伤身伤胃；饭最好要吃七分饱，常暴饮暴食会引起身体疾病；玩手机也要有个度，不要整天手机不离眼，那样对眼睛伤害很大。

说到“没识足”，还会想到另一个词叫“知足常乐”。知足常乐是人的的一种心态，也是人的一种涵养和品德，更是一种认知和感悟。一个人知足，并不是说不思进取、安于现状，而是能够看淡名利。正所谓：知足者，贫穷亦乐；不知足者，富贵亦忧。土话“没识足”的运用，也体现了当地人“知足常乐”的朴素价值观。

## 晋方言

石敬瑭在位7年，一直对耶律德光低头服小，原先承诺的割地输帛全部兑现。公元942年，石敬瑭病死，养子石重贵继位，是为后晋出帝，景延广任同平章事。本来石敬瑭临死遗言让刘知远辅政，但景延广权欲太重，暗中劝石重贵，不要把先帝的遗诏露出来，只把刘知远加为检校太师，调任河东节度使，后来又封为“太原王”。

时过境迁，后晋和契丹的关系也起了变化。石重贵对契丹越来越冷淡了，送的礼物不但不厚，而且完全是在应付，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。于是从公元944年起，契丹连续三次挥兵南下中原。

刘知远对后晋的功劳很大，而出帝石重贵却没有重用，他心里不免有了怨气，快快不乐地到晋阳后，便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。在契丹南下之时，他也抵挡并击败过契丹军，但态度并不十分积极，后来就有点坐山观虎斗了。他知道晋阳这地方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，就暗自积蓄自己的力量。

机会终于让刘知远等来了，耶律德光挥师南下中原，前两次都没有占到便宜，公元946年，他第三次举兵南下。此时，后晋又出了个野心家。都招讨使杜威也想依靠契丹的势力，当一个石敬瑭式的皇帝，就私通契丹，让契丹大军长驱直入，于第二年春天进入国都开封。耶律德光俘获“孙皇帝”石重贵，狠狠责骂了一顿，下令把他们一家押送北方。耶律德光在开封坐了龙庭，表示自己做了中原的皇帝，宣布以大辽为国号，把契丹的会同十年改为大同元年。

刘知远此时在晋阳难以预见局势的发展，眼见辽兵强盛，还不到同其对抗的时候，就派遣客将王峻奉着表章到了开封，送给耶律德光，祝贺他入主中原。又说本想亲自入朝来贺，但河东境内汉人、少数民族杂居，情况十分复杂，须时时提防有什么变故，所以不敢离开晋阳。耶律德光接到这封表章，以为刘知远真的忠于自己，十分高兴。他为了笼络刘知远，就让左右草拟出褒奖的诏书，以最高的规格奖赏他。大臣们忙着写出草稿送给他过目，他看了以后，在刘知远的名字前加了个“儿”字，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。在辽国只有最亲近最信得过大臣，才能得到“儿”的殊荣。耶律德光又郑重地取出一根木拐来，命王峻拿着木拐和褒奖诏书返回晋阳。这木拐可不是寻常之物，辽国有个传统，只有最重要最尊贵的大臣才能得到。在辽国只有德高望重的皇叔伟王得到过一根。当王峻奉着木拐往晋阳走的时候，沿路的辽兵一见木拐，都如见了神物般恭恭敬敬地致礼让路。

王峻回到晋阳把诏书和木拐奉上，刘知远询问开封的情况，王峻便把看到的和听到的一股脑儿报告刘知远。

耶律德光占据中原后，下令各地方搜刮百姓，向京城贡献钱物。随他而来的契丹贵族们每天寻欢作乐，醉生梦死。那些归顺的将领向他要军饷，耶律德光笑道：“什么军饷？我们向来就不搞这一套，你们的队伍如没吃的了，就去‘打谷草’嘛！”他说的“打谷草”就是让军队去抢劫。如此一来，许多地方老百姓的财产和牲畜被抢掠一空。辽王又把各州府的钱帛“括借”来储藏在内库中。他把契丹人封为各地方的官员。他们语言不通，风俗不懂，一些地方的地痞流氓不赖就同他们勾结起来，敲诈勒索老百姓，老百姓拿不出就严刑拷打。“打谷草”的辽兵去了一批又一批，抢得后的就抢，抢不到的就杀，许多村落成了废墟……人们无法忍受了，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一带纷纷起义。刘知远知道时机已经成熟，他让心腹将领、河东指挥使史弘肇把部队召集起来，宣布向河北出发，要去迎回被辽押往北国的故主石重贵。军士们齐声说：“天子已做了辽国的俘虏，现在谁是我们的主子呢？谁来为我们做主呢？要不就请太原王先正位当皇帝，然后再出师。”史弘肇马上返回把军士们的建议告诉了刘知远。刘知远心中高兴，他此举本来就是测试军心，但却装出严肃的样子说：“这些兵们真不懂事，不知胡说的些什么，现在辽国正强盛，应想着趁这时候建功立业才对。”让身边的官员禁止士兵们乱说。到了校场时，军士们正在争相呼喊万岁，那官员传下命令，才慢慢地安静下来，回营去了，但太原王当皇帝的声势却也造出来了。

当天晚上，就有行军司马等人上书劝进，刘知远当然不答应。第二天又上书，刘知远召来心腹将领郭威等人商量，都押衙杨邠说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大王如再谦让，人心要乱起来，说不定会出什么变故。”郭威接着说：“杨押衙说得对，大王不要犹豫了。”刘知远沉思了一阵说：“既然你们都这样说，我也实在躲不过你们，但我是不能忘记咱们大晋的，不能改国号改年号。”郭威说：“那些其实都无所谓。”众人商议着定了一些细节。

公元947年农历二月辛未日，刘知远在晋阳宫内穿着袈裟，登殿受群臣拜贺即皇帝位。新皇帝颁发旨意，仍称晋朝，至于年号，略去了晋出帝的“开运”，从石敬瑭的年号往下排，称天福十二年。

刘知远称帝后，又装模作样地亲自带着部队出发，说是要迎回晋王石重贵。到达寿阳时听说早过去了，大概也快到黄龙府了，刘知远就率军返回晋阳。



五代晋阳